

李渔的故国情结

杨琳

【提要】李渔是清初著名的小说戏曲家，他组织家庭戏班奔走于权贵之门，以卖文和演戏为生。学界历来对他的人品评价都不高。事实上，游走权贵、托钵为生只是他的表象，在骨子里，李渔是有着深厚的故国情结和爱国之志的人。他对明朝心怀忠贞，以致终身不仕。他在自己的作品里留下存史以存故国的意愿，以乱世之人“死易生难”，论人应当“原心不原迹”为自己未能殉国做内心开解，并写作小说以劝人为善。这些将给学术界展示更为完整全面的李渔形象。

【关键词】李渔 李笠翁 清初戏曲 故国情结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 (2009) 06—0107—08

李渔，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后又更为李渔，字笠鸿。他是清初著名的小说戏曲家，其作品主要有小说《无声戏》、《十二楼》，戏曲《笠翁十种曲》，杂著《闲情偶寄》。章回小说《合锦回文传》和《肉蒲团》据说也是李渔所作。

明清易鼎后，李渔以创作小说戏剧谋生，常组织家庭戏班奔走于清朝新贵或贰臣之门到处打秋风。他说话直率真诚，很少伪诈，作品为谋生也多浅易媚俗，故时人对其人品多有意见，评价不高。如清初董含《三冈识略》卷4“李笠翁”条云：“李生渔者，自号笠翁，居西子湖。性齷齪，善逢迎，遨游缙绅间，喜作词曲及小说，备极淫褻。常挟小妓三四人，遇贵游子弟，便令隔帘度曲，或使之捧觴行酒，并纵谈房中术，诱赚重价。其行甚秽，真士林所不齿者。予曾一遇，后遂避之。夫古人绮语犹以为戒，今观《笠翁一家言》，大约皆坏人伦、伤风化之语，当堕拔舌地狱无疑。”^①

现代研究者对李渔的评价当以鲁迅为代表。鲁迅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中说：“就是权门的清客，他也得会下几盘棋，写一笔字，画画儿，识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这才能不失其为清客。也就是说，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鲁迅的评论对于李渔的艺术才华是给予了肯定的，但对李渔的人品则不以为然，甚至可以说几分轻视。“帮闲文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成了李渔的总体评价。

但事实上李渔的情感要比评者认为的丰厚得多，且以忠贞为主，始终难忘故国，不愿出仕新朝，为了生存，只能选择卖文演戏为生的这条道路。虽然他没有坚持做隐居避世、足迹

① 王金花、黄强：《董含〈三冈识略〉“李笠翁”条考辨》，《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

不履城市的遗民，虽然近似俳优乞丐，托钵新贵贰臣之门的生活方式备受非议，但总强过出仕新朝或作贰臣，更何况他本有治世之才也有治国之志，却宁肯甘于下流，不应试不出仕新朝，不能不说始终怀有对故国的情感。

一、心怀忠贞

李渔是一个忠贞观念很强的人。“臣子报君，与士报知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祭福建靖难总督范颉公先生文》）是他一贯持有的观点。李渔曾在传奇《比目鱼》中，描写一对秉志忠贞、至死靡他的情侣。王端淑《比目鱼序》指出：“笠翁以忠臣信友之志，寄之男女夫妇之间，而更以贞夫烈妇之思，寄之优伶杂伎之流”。指出李渔是以贞夫烈妇的情感比拟忠臣明君的节烈。除戏剧外，抗击金兵、统一祖国的岳飞以及宁死不屈、不仕异族的文天祥是他心中的民族英雄，也是他笔下常提到和表彰的人物。李渔和“西冷社”社友曾同游岳坟。在岳飞像前，李渔即兴写下《谒岳武穆王墓》：“忠臣尽瘁矢无他，万死甘心奈屈何。三字狱成千古恨，从来谤语不须多。”李渔在《古今史略》中还写有《论文天祥之全节》一文，以为“至于文丞相之死，不死于八日不食之余，而死于三载尚存之后，真所谓千锤之铁，百炼之钢，较尸浮海上十万余人，犹觉忠纯义至”，高度赞扬了文天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忍辱不死矢志抗元的行为。

除崇敬民族英雄外，对当朝的忠烈之士，李渔也发自内心地进行表彰。如《婺城行吊胡仲衍中翰》：“婺城攻隐西南角，三日人头如雨落。轻则鸿毛重泰山，志士谁能不沟壑。胡君妻子泣如洗，我独破涕为之喜。既喜君能殉国危，复喜君能死知己。生刍一束人如玉，人百其身不可赎。与子交浅情独深，愿言为之杀青竹。”认为韩仲衍殉国难的忠贞之行实应堪喜。《祭福建靖难巡道陈大来先生文》记述宁死不叛的陈大来，其言铿锵有声：“吾世受国恩，今以死报。我忠于国，而辈当忠于我。”余霁岩在文后评：“笠翁树帜文坛三十余载，人但以风流才子目之，不读此文，乌知其为大贤人、真义士哉！人许大来以豪杰，不能

尽料其忠贞，亦犹是也。无怪二公有水乳之合。”称李渔为大贤人、真义士，可谓知李渔者。

李渔表彰忠烈的同时，对失节仕新朝的人由衷鄙夷，由此也可看出他不仕新朝的原因。李渔曾在《古今史略》中评价魏徵事太宗一事：“魏徵事上，每不存形迹，上让之，徵言：‘君臣一体，何形迹之可存。’又言：‘臣愿为良臣，毋为忠臣。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良臣也。龙逢、比干，面折廷诤，身诛国亡，忠臣也。’上悦，赐绢五百匹。”李渔评：“问魏徵愿为良臣，不愿为忠臣，是欤？”表明李渔不赞同魏徵的意见。联系当时廷臣的辩论中，就有人以魏徵事太宗为“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为自己出仕新朝作辩护。《清史稿》卷254载，冯铨曾诘龚鼎孳尝降李自成，多尔袞因问：“铨语实否？”龚鼎孳竟曰：“岂惟鼎孳，魏徵亦尝降唐太宗。”《清史列传》七十九则云：“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徵亦曾归顺唐太宗。”就可看出李渔对时事的态度。李渔不仅借历史人物隐曲地表达自己观点，还直接嘲笑那些失身新朝的官吏。《笠翁别集》卷10《论桓元伪旌隐士》指出“晋风偷薄，凡为士类者，只知得禄之为荣，不念失身之可耻，当（桓）元受禅之日，蛇行鼠伏于其庭者，不知凡几。”从中可读出李渔对他们强烈的愤恨和厌恶。

一个人的人生观会受其亲密友人的影响，而他们情感的亲密也是因为在思想上有很多共通之处，有着相似的人生观、价值观。故而考察他身边亲密友人的世界观，可以加深对此人的了解。李渔的亲密友人之一是睡乡祭酒杜浚。杜浚对李渔十分推崇，曾为短篇小说集《无声戏》、《连城壁》、《十二楼》，传奇《凰求凤》作序，又为《闲情偶寄》诗文及传奇《玉搔头》、《巧团圆》作评。杜浚（1611～1687）原名绍先，号睡乡祭酒，湖北黄冈人，明朝著名遗民，持节甚严。《清史稿·遗逸》有传：“（杜浚）明季为诸生，避乱居金陵。少倜傥，尝欲著奇节……其在金陵，……金陵冠盖辐辏，诸公贵人求诗者踵至，多谢绝。钱谦益曾造访，至闭门不与通，惟故旧徒步到门，则偶接焉。”如此持节甚严的杜浚，与李渔堪称知交密

友，可见，李渔的人品也与之仿佛。

二、终身不仕

李渔年少聪颖，本来也是热衷仕途、有志科举之人。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李渔25岁，赴婺州参加童子试。首次应试就以优异的成绩考中秀才。崇祯十一年，李渔进入金华府学，攻读举业，准备参加乡试。崇祯十二年首次赴杭参加乡试，结果名落孙山。李渔落第后的第二年，即崇祯十三年，作《凤凰台上忆吹箫》词：“昨夜今朝，只争时刻，便将老幼中分。问年华几许？正满三旬。昨岁未离双十。便余九还算青春。叹今日虽难称老，少亦难云。闺人也添一岁，但神前祝我早上青云。待花封心急，忘却生辰。听我持杯叹息，屈纤指不觉眉颦。封侯事且休提起，共醉斜醺。”写出了他的妻子祷神盼其能早日登科的急切心情，也可知出仕一直是他家人对他的期盼。崇祯十五年，明王朝举行最后一次乡试，李渔再次前往杭州应试，但此时局势不安，行到中途，便遇到警报，李渔只好回家。自此以后，明王朝再也没有举行乡试，李渔也就再也没有应试。但是李渔内心深处，始终有着读书为官、荣身耀家的思想，并始终为自己未能实现人生的理想深感难过，对于寄寓自己很大希望的母亲深感愧疚。某天夜里，他还梦见母亲责备他荒废举业，醒后作诗《夜梦先慈责予荒废举业，醒书自惩》：“久失过庭教，重为泣杖人。已孤身后子，未死意中亲。恍惚虽成梦，荒疏却是真。天教临独寐，砺我不才身。”^①第二年给母亲扫墓时，又作《清明扫先慈墓》一诗：“高家如山足草莱，松楸虽说几曾栽。三迁有教亲何愧，一命无荣子不才。人泪桃花都是血，纸钱心事共成灰。鸡豚未及存时养，此日椎牛亦枉哉”。^②仍然觉得自己作为儿子未能登科作官光宗耀祖，心中十分有愧。

对李渔易代后自愿做逸民、终身不再出仕的原因，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大部分学者认为李渔做这个选择主要是受当时时代风气的影响，是作为个人生活情趣、生活方式的选择，而非出于一种道德操守、政治态度的特定选择。所以在对李渔的评价上，黄果泉就指出“他的不

举不仕，主要出于‘自适快乐’的人生选择，与遗民不仕异姓的政治选择不同，后者大多属于被迫的‘隐遁’，往往含有不甘、义愤之情。”并且认为李渔“既缺乏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儒者精神，也少有浊世独立、高风亮节的士人操守。进一步说，他在淡化政治原则、道德操守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怀疑并调侃人世间的一切崇高品质。”但是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李渔保护自己的一层迷雾，拨开重重迷雾我们才能看到李渔忠贞爱国的内核。

明清易鼎时，李渔年方34岁，正值壮年，在中国古代此时中举仍属年轻之辈。但一贯热衷科举的李渔却断然放弃，再也不提应试之事，这不由得使人怀疑他的放弃举业与易代有关。为打消疑虑，表明清白，以避时祸，李渔专门写道：“追忆明朝失政以后，大清革命之先，予绝意浮名，不干寸禄，山居避乱，反以无事为荣”。将自己有隐逸之志的时间定为清朝革命之前，正如朱东润先生指出：“笠翁之言，好为吊诡”，^③这种过分强调，反有欲盖弥彰之嫌，更能使人深味他入清后不再应科举的原因。

笔者认为李渔的不再出仕，其主要原因并不是他生性不喜约束，不喜科举，而是难以摆脱内心对故国的情感。首先，李渔是热衷科举而非不屑科举之人。梳理明亡前李渔的经历，我们就能明显地看到他曾多么醉心科举，曾多么希望可以光大门楣荣耀先祖。他屡次应试，屡败屡战，明朝最后一科考试都坚持到底，依然参加，可见出仕的愿望和决心之大。事实上，终其一生，李渔都对科举充满感情。尽管举业不顺，屡屡下第，他也只是怨恨考官的不公正，从未对科举制度本身有所怀疑。在他生活的年代，不少清醒的知识分子都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深刻的批判，甚至有人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八股取士制。但李渔只是批判考官庸暗无识，营私舞弊，对科举制度本身却

①② 《李渔全集》第2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2、158页。

③ 朱东润：《李渔戏剧论综述》，《文哲季刊》1943年第3卷第4号。

是很认可,很热衷的,并且希望自己和子孙都能借此荣进,入清后依然如此。李渔第二个儿子将开出生时,他的两个朋友范印心、卢高来访,两人都是进士出身,眼下在官府分任要职,李渔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在《辛丑学举第二男,诞生之际适范正、卢远心二观察过访,亲试啼声而去。因此双星命名,征佳兆也》一诗中写下“全凭此日轩和冕,逗出他年印与戈”,反映出李渔在仕途上的用心和期许。

其次,李渔骨子里并不是不问世事的隐逸之人,而是有治国抱负,且有治国才能,并渴望参与国事的。李渔曾搜集明清官吏的案牍文章汇编成《资治新书》,书分为初集和二集。《资治新书》,顾名思义,是供各级官吏治理政事作参考的,此书被称为“宦海津梁”,它的编撰显示了李渔高度的政治热情和高超的治世才能。除《资治新书》的编撰证明李渔的政治才能外,从当时人对他的评价上也可略知一二。与李渔同时代的了解他的朋友大多对李渔终生未仕的遭遇深表同情与遗憾。郭传芳在《慎鸾交序》中认为:“嗟乎!笠翁不矜报负,惟解怜人,人苟鲜恶而即称为善。斯名士之心乎,抑大吏之心乎?予固谓笠翁为当今良吏,惜乎有蕴莫展,而徒使建帜于风雅之坛。笠翁之以传奇著,犹予小子之以咸丞著耳!”感叹李渔有做当世良吏的才能但却终身不遇“有蕴莫展”的遭遇。他还进一步分析了李渔有才不展的原因:“笠翁当今良吏也,抱实际而躬虚务,无心当世也明矣。”指出李笠翁“抱实际”即有治国的才干,却“躬虚务”仅仅做编书著述的这样事情,并不应举出仕的原因是“无心当世”,可谓一语中的。^①从李渔的诗词也可看出他不出仕的主要原因:“我不如人原有命,人能恕我为无官”,^②他认为自己一生沦落至此,不是因为自身不努力或不具有才能,而是因为命运。是无法抗拒的命运——明清鼎革——导致自己失去了仕进荣身之路,只能靠创作出版戏曲小说与打秋风度日。而这种在新朝游于权贵之门的生活方式还能被人谅解,就是因为不出仕新朝,尚秉有气节。

最后,李渔对儿子游泮和参加科举的态度也可以反映出他当初不出仕的真正原因。康熙十四年,65岁的李渔送长子将舒、次子将开赴严陵应

童子试。回杭州时,路过严陵钓台,写下《严陵纪事八首》及《多丽·子陵钓台》词,表达了自己的羞愧之情。《严陵纪事八首·其七》:“未能免俗辍耕锄,身隐重教子读书。山水有灵应笑我,老来颜面厚于初”,认为自己一生不仕,却要教子读书,送子应试,是厚着脸皮才能做到的丑事,会被山水所笑。“老来颜面厚于初”一语则是暗示了李渔当初不出仕的原因。《严陵纪事八首·其八》(送两子应童子试(康熙十四年),到严陵):“猿鹤相逢虑见猜,却因鄙事挂帆来。严陵不为儿孙计,归去何颜过钓台。”在这里,他将出仕新朝看作是“鄙事”,可见他宁可托钵打秋风也不肯作清吏的潜在心理。到了晚年,为儿孙考虑,只有出仕一途,才能彻底解除贫困,所以不得已只能厚着脸皮送儿子应试,但在过严陵钓台时还是觉得羞惭难当。“过严陵,钓台咫尺难登。为舟师,计程遥发,不容先辈留行。仰高山,形容自愧;俯流水,面目堪憎。同执纶竿,共披蓑笠,君名何重我何轻。不自量,将身高比,才识敬先生。相去远,君辞厚禄,我钓虚名。再批评,一生友道,高卑已隔千层。君全交未攀袞冕,我累友不恕簪纓。终日抽风,只愁戴月,司天谁奏容为星?羡尔足加帝腹,太史受虚惊。知他日,再过此地,有目羞瞠。”这首词表达出的内心羞愧与真诚忏悔,足以令人感动。

其实在当时,即使是遗民送子侄辈或劝勉子侄辈出仕也是很正常的事,并不觉得有什么可羞愧之处。戴名世说:“自明之亡,东南旧臣多义不仕宦,而其家子弟仍习举业取科第,多不以为非。”^③甚至对遗民子弟出仕有“艳称”者,钱谦益撰遗民柯元芳墓志铭,记当其子仕清为枣阳令时,“君喜曰:‘自今可以舒眉坦腹,长为逸民矣’”,^④而李渔连教子读书都感到十分羞愧,送儿子应试过严陵钓台时会觉得羞惭难当,可见李渔在内心深处对政治操守还是要求很严的,不仅自己不

① 黄鹤山农在《玉搔头序》中也感慨李渔的有才不用世:“嗟乎!笠翁有才若此,岂自知瓠落至今日哉。”瓠落指有政治才能但最终不得用世。

② 《李渔全集》第2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7页。

③ 《戴名世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9页。

④ 《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08页。

出仕新朝，连儿子出仕新朝都会觉得内心愧疚。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李渔壮年放弃科举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不想为新朝效力。

清朝建立后，顺治元年就实行科举，顺治二年乡试后，顺治三年又命再行乡试，顺治四年会试，连岁开科以分化汉族知识分子，吸引他们为新朝服务。当时有不少人应试，甚至很多簪缨世家、久沐皇恩的人也竞相奔走在求取官职的道路上。随着时间的流逝，清朝统治日益巩固，复明的希望逐渐渺茫，出仕清朝的诱惑越来越大，以至后来出现“一队夷齐下首阳”的现象，戴名世曾说：“明亡也，诸生自引退，誓不出者多矣，久云，变其初志十七八”。^①顾炎武《广宋遗民录序》云：“岂无一二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于中道，而失身于暮年”。但李渔面对令人垂涎的香饵无动于衷，没有像在明朝时那样热衷仕进。据《龙门李氏宗谱》载，李渔以上祖宗九代无一人做过官，因此他不具有为明守节的必须和资格，在这种背景下，未受寸恩的李渔能一生坚守不出仕，并在送子应试之时内心羞惭不安，可见其对故明的情感。

有人说李渔自己虽未出仕，但终日托钵游走于新贵与贰臣之门，以卖文演戏为生，也属五十步和百步之差了。事实上，在当时，卖文为生很普遍，很多文人以及不食朝廷俸禄的遗民都选择卖文自食的道路，魏禧“频年客外，卖文以为耕耘”，^②戴名世“余之游四方，以卖文为生”，甚至是“非卖文更无生计”。而且当时有类似做法的人颇多，“里巷穷贱无聊之士，皆学为应酬文，以游诸公贵人之门。”^③甚至有些遗民明确地提出“卖文为生合理”的主张，如方文直接宣称“卖文为活本儒风”，归庄特作《笔耕说》为之张扬，坦言“余亦为活者之事”。可见李渔卖文为生的道路并没有多少可争议之处，时人大多能接受，不能接受的是他逢迎新朝权贵之门、打秋风谋取生活费的行为。不少研究者认为“笠翁的品节甚不足道。他是明朝游过泮之人，当鼎革之际，纵然不能了却秀才事，也尽可如杜浚之安贫自守（浚明副贡生）。却为了吃饭和享乐问题，东奔西驰，不顾风节，

完全抛掉了书生本色。他虽然没有事新朝，却服侍了无数的新贵，这和他们是一样无耻。无怪当时人对他不敬。”^④这里对李渔品行的批判也是着眼于他游于公卿权贵之门。事实上，我们也要看到李渔的难处，在中国古代，应试出仕大概是文人唯一一条荣身富家之路。在士人纷竞出仕的清初，李渔宁可托钵也不肯“题桥”的行为是有些风骨在的！何况托钵权贵之门并不快乐风光，而是心中充满了酸辛。“矧又贱性蹉跎，耻为干谒，浪游天下几二十年，未尝敢尽一人之欢。每至一方，必量其地之所入，足供旅人之所出，又可分余惠以及妻孥，斯无内顾而可久。不则入少出多，势必沿门告贷，务尽主人之欢；一尽主人之欢，则有口则留之，心则速之使去者矣。”^⑤这种反复揣摩主人的心理，投其所好，买其欢好，唯恐招厌的感觉想必也很痛苦，而李渔宁可忍受这种痛苦也不出仕，是需要有不仕新朝的决心在的。

三、原心不原迹

虽然终身不仕，虽然自知“人能怨我为无官”，李渔对自己未能像死节的朋友那样殉国仍感到不安，为此，他自己建立了一套价值体系，借此进行自我开解，使自我行为正当化。他认为后死者往往比殉节者需要更多的勇气，忍辱不死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做。在乱世之中，看人做事应该秉着“原心不原迹”的原则，只看是否尽心，而具体行为则不必过于苛责。这些理论中都有着李渔自况和自我开解的意味。

在《祭福建靖难总督范觐公先生文》中，李渔写道：“渔窃以人臣之事君也，为良臣易，为忠臣难，为遄死之忠臣易，为忠臣而不得遄死，天若留之以有待，乃至势穷力竭，究竟无益于国，徒苦其身而后死者，尤难！此忠臣之

①③ 《戴名世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1、292页。

② 《魏叔子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89页。

④ 《李渔全集》第20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

⑤ 《李渔全集》第3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04页。

服上刑，较龙逢、比干而什佰其惨者也。”^① 认为后死任国难，勇于面对现实，比即死之忠臣更难能可贵。因为后死者活在新朝的环境里，大多要面对各种诱惑甚至生存的压力，能够心怀故国忍辱不死是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死易生难”难就难在生者有比殉难而死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情做。《十二楼·奉先楼》第一回就是“因逃难姘妇生儿，为全孤劝妻失节”。在乱离之中，舒秀才只有一个独子，眼看难保。此时舒娘子与舒秀才商量：“还是要我捐生守节，做个冰清玉洁之人，还是要我留命抚孤，做那程婴、杵臼之事？”舒秀才认为有处常，有处变，忍辱抚孤的意义远远大于殉节，所以建议娘子要保全性命，抚养儿子长大。不仅舒秀才如此认为，即使两人以此事询问族人，族人也大多这样认为。《十二楼·生我楼》的第一回里，李渔提出乱世之中论人之法当是“原心不原迹”，“所以论人于丧乱之世，要与寻常的论证不同，略其迹而原其心，苟有寸长可取，留心世教者，就不忍一概置之。”“生难死易”、“原心不原迹”是李渔价值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李渔的自我开解。易鼎之后的李渔并未选择殉国，而是选择活下来。但怀有故国之心存于异族新朝，生活是十分不易的，既要应对因不肯“题桥”带来的生存压力，又要抵制各种功名富贵的诱惑，还要想方设法地养活自己，而且在选择养活自己的生存道路上又面对着世间的种种舆论和不理解。李渔深切体悟了“生难”的含义，才在作品中或直接发抒议论或借助形象塑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对自己当时未能殉国的内心做开解。他选择生存的原因除了认为生命的重要之外，还有两大任务，一是“存史以存故国”，一是“肖木铎做劝世之书”。

四、存史以存故国

存史是故国情结中重要的一部分，大凡心系故国的人都希望能借助修故国史来保存心中的故国形象。李渔也不例外。李渔曾著《古今史略》，在其中充分表达了他的史学观点。《古今史略》写于顺治十六年，即公元 1659 年。全书共 12 卷，从远古的传说时代，一直到明崇祯

十七年（公元 1644 年）清军入关进北京城止。其中宋元以前计 7 卷，有明一代则占 5 卷之多，可见李渔借通史写《明史》之意。

从篇幅上看，《古今史略》用全书三分之二的文字着重介绍了明代二百余年的历史，而明代历史的实际长度仅仅占从夏到明总长度的十四分之一。作眉批时恰恰相反，记载明代历史的后 5 卷所批甚少，特别是记载崇祯一朝的后 3 卷，竟不批一字。在当时，私人写明史是很触时忌的事，更何况下批断，因此李渔不批明史是很容易理解的。尽管未做直接批点，但是他对明朝事的看法很多都隐曲寓含在对前几个朝代的批点中。《古今史略》缺南明史，但是《南宋纪》中的《高宗皇帝纪》是所有皇帝本纪中字数最多、评论最密的。高宗皇帝类似南明的弘光帝，统治的都是偏安江左的小王朝。《南宋纪》中仅高宗皇帝一条李渔就连写了十二条评论，可见对此节的重视。我们仔细阅读文字和批评，可以感知李渔以古拟今，将南宋小王朝比作南明小王朝的深刻用意。如卷 7 对南宋高宗好读《春秋》，批曰：“春秋之义莫大复仇，高宗有不共戴天之仇而不知复仇，亦何取读《春秋》哉？”李渔在此直把高宗看作弘光，表达了对其不能励志统一江山的恨铁不成钢的不满，也可读出他对异族占领江山呼之欲出的痛恨情感。

《古今史略》卷 7 到卷 12 是《明纪》，在对当时时事的记载中，我们从字里行间都能读出作者的态度。如对推翻明朝统治的农民起义军的憎恨，“张献忠袭陷蕲州，明日令缙绅、孝廉、文学各冠带，自东门入，西门出，尽斩之。遂屠蕲州，留妇女毁城，稍不力，即杀之”，^②写出了农民起义军的残忍。有的文字表彰忠烈之士，亦可见李渔的忠烈之心。“庚午，李自成遣贼陷麻城，城空无人。癸未，自成攻陕县，知县李贞率士民坚守，贼一鼓而拔，纵兵大杀。李贞厉声叱曰：‘驱百姓死守者知县耳，妄杀何为！’骂贼不已。自成怒，捋其衣，倒悬于树。

① 《李渔全集》第 1 卷，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7 页。

② 《李渔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91 页。

贞大呼曰：‘高皇帝有灵，我必诉上帝以杀贼！’贼断其舌，刖之。母乔氏及其妻俱死”。^①书中对大清军队的不满与谴责虽不敢明言，但在他的记叙中可以感知他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清军暴行的谴责和对死于抗清的忠烈的表彰。“二月，大清兵薄大同，马莲口有诸生张桂，抗敌死亡。”^②“己亥，大清兵入喜峰口，巡关御史王肇坤死亡。丁未，大清兵深入略山西，己酉间道过昌平，降丁内应，城陷。总兵巢丕昌降，主事王桂、赵悦、太监王希忠等皆被杀，焚天寿山德陵。丁巳，大清兵攻宝坻，入之，杀知县赵国鼎。癸亥，大清兵入宝兴，杀家居少卿鹿继善。又入房山”。^③虽并无评论，但看似平静的叙述里尽显清军杀人的残暴和百姓死状的悲惨。《古今史略》里还附有殉难录，表彰忠烈之义，可看出作者有心存史的用意。

除在史学专著《古今史略》中记叙评论国事外，李渔还在其他作品里探讨了明代灭亡的原因。宦官专权，祸乱朝政一直是晚明的大患。宦官监军，只为贪自己军功而不顾国家大业，致使明朝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李渔在《凰求凤》一剧中，就以正统朝的太监王振监军与异族瓦剌作战为背景，描绘了太监王振只顾自己立功，置国家安危甚至君主性命都不顾的丑恶嘴脸。在《玉搔头》中，李渔也指出因皇帝年轻致使宦官专权的现实。刘瑾说：“自从先帝晏驾，今年纪幼小，内外的事都是咱家执掌。外面有个口号，叫今上是坐的皇帝，叫咱家是站的皇帝。”^④太监敢自称为皇帝，可见其专横与跋扈。

宦官能够博得皇帝的信任，得以大权独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武官员的腐败无能。文官的腐败无能主要是因为科举考试的腐败导致无法荐拔真正有才能的人。《怜香伴》就塑造了靠作弊进科举的周公梦这一人物形像。周公梦本来“终日眠花醉柳，喝六呼吆”，在教官岁考时品行就应评定为劣，但是因送了教官三十两银子，书办门子各三两银子，就免被定为“劣行”。不仅如此，他在考场里又收买了一个科举老吏，将别人做的文字割下来，凑在他的卷子上，竟中了举人，可以进京会试。而在会试之前，他又想了很多作弊之法，虽然周公梦想的办法很巧，足以瞒得过众人，但是李渔还是没

有让他得逞，而是安排了神仙氤氲使者来揭露他舞弊的事，可见李渔对舞弊现象的痛恨，这种靠舞弊而踏上科举之路的官吏，日后显然无法承担国家的重任。但是李渔只看到科举考场中不公正现象带来的危害，对此加以指责，并没有认识到八股取士制度自身的严重缺陷，这是李渔的局限。

在武将上，问题更多，很多武将都是领不得兵，打不得仗的，这和当时社会现实紧密联系。明末国家粮饷严重不足，号召人民捐饷。捐饷之后，无论有无将材都授以武职，导致很多武官并无实际的才能。《奈何天》中，阙素封就听了仆人阙忠的话捐银给朝廷作军饷，主仆都得到了封赏，阙忠被封为“军前赞画”，并得到许诺：“勉力建功，待边疆宁静之日，连你主人的功绩一同具疏。”后来阙忠果然被升为“招讨使”，而他的主人也被封为“尚义君，位列公侯”。两人虽为武将，实际上都不谙军务，若有一天真需领兵打仗，其后果可想而知，所以当时朝廷战斗力很弱。李渔在《奈何天》中借造反的塞北女叛将骂道：“咱白天王起兵以来，攻破无数城池，杀伤许多官吏；起先只说南方有人，不可轻敌，及至到了这边，才知道偌大的中原竟没有一个男子。做文官的但知道赋诗草檄，做武将的只晓得喂马支粮，一到守城上阵的时节连那赋诗草檄的文官，喂马支粮的武将都不知哪里去了，刚刚剩下些老百姓来祭咱的刀头。”^⑤这种文官贪赃枉法、搜刮钱财，武将贪生怕死、只顾争功保命的现象在《蜃中楼》中也有反映。

朝廷政治腐败、文贪武惰，导致流寇四起，盗贼横行，百姓倍受其苦。《意中缘》中的刘香老原是漳州一名海户，开始只是偶尔黑夜在漳州海边图谋不轨，后来则“不上三年聚起数千人马，图进兵建宁地方谋寻大事。”《巧团圆》也是以李自成军队横行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家破户焚，妻离子散的人间惨剧。《比目鱼》里也有“在万山之中招兵买马，积草屯粮驯养二十余年”的草寇。宦官专权、文贪武惰、盗贼横

①②③ 《李渔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91、360、363页。

④ 《李渔全集》第10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39页。

⑤ 《李渔全集》第9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068页。

行、内忧外患交并，最终导致明代的灭亡。李渔就在他的作品中含蓄而又无比痛心地探讨了故国灭亡的原因。所以有的评者认为万晴川在其著作《风流道学——李渔传》中指出：“李渔既无吴伟业等剧作家的故国之思，也没有苏州作家的慷慨悲凉”，这是被李渔精心构造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并不是真正理解与懂得李渔之语。

李渔不仅用作品存史以存故国，还想借里人木铎，做劝世书，希望可以于世有所裨益，杜浚在《十二楼·序》中指出：“觉道人山居稽古，得楼之事类凡十有二，其说咸可喜。推而广之，于劝惩无助，于是新编十二楼复哀然成书，手以视余，且属言其端，……语云‘为善如登’，笠道人将以是编偕一世入结欢喜缘，相与携手，徐步而登此十二楼也，使人忽忽忘为善之难而贺登天之易，厥功伟矣。”指出《十二楼》的作意是劝人为善。

无声戏刊本的扉页介绍也用“多寓劝戒之意”来形容此书的主题。而《无声戏序》的作者伪斋主人也认为无声戏的家旨是教人“持盈守正，免于祸患”。可见李渔作小说目的乃是为了劝善。就像他自己在《闲情偶记》中说的那样，“因愚夫愚妇识字知书者少，劝使为善诫使勿恶其道无由，故设此种文词，借优人说法，与大众齐听，谓善者如此收场，不善者如此结果，使人知所趋避，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弥灾之具也”。

五、小结

总而言之，李渔虽有忠贞之志，有隐逸不

仕之心，有存史以存故国的行为，有做醒世之本铎的意识，有原心不原迹的开解，这都是他怀有的对故国的深厚情感的一面，但他性格的主要方面还是享受生活，做一个“适世”的人。所以尽管他怀有对故国深沉的情感，尽管这种情感会不时地浮上来，他也会小心翼翼地将它压下去，去做一个在新朝保全性命的“顺民”。所以在心存不满的情况下，他还是剃了发；斩钉截铁地辩解自己的文章都绝无所指，只是为了给圣天子粉饰太平。《无声戏二集》惹祸后，他心怀畏惧，认认真真删去所有惹祸的内容，换了一个名字再销售；时时强调自己不再出仕的念头出现于“大清革命之先”。他很清楚发牢骚与政治上惹祸的区别，也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就像他在《奈何天》开端所写“饶伊百计奈何天，究竟奈何天不得”，世事和时代已经变了，他只能偶尔流露一下心底的情感，以“我不如人原有命，人能恕我为无官”作自我开解而已。1659年，当郑成功开始对南京进攻前，李渔及时地离开南京，返回杭州，他不会让自己涉入真正的政治旋涡，对恢复故明的遗民战争已不感兴趣了。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
系毕业博士，南开大学博士后，北京青
年政治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马 光

Li Yu's Nostalgic Feelings of Home Country

Yang Lin

Abstract: Li Yu is a famous writer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He organized a family theatrical troupe, running around the door of the power and privilege in order to sell articles and act for a living. In a long time, the evaluation of him is not high. In fact, Li Yu had a profound feeling of Ming Dynasty. Focusing on Li Yu's nostalgic feelings of home country, this paper discussed Li Yu's loyalty to his home country, his refusing to be an official, and his articles advising people to be good. The paper tries to present a more complete image of Li Yu.

Key words: Li Yu; Li Liweng; opera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nostalgic feelings of home country